

创作谈

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长安的荔枝》，谈历史小说写作——

忠诚地沿着史实方向奔跑，但未必始终不离这条跑道

马伯庸

摆渡于史实和想象之间的长安往事

■本报记者 柳青

《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和《长安的荔枝》这些小说里，给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作者在紧迫的时间刻度里安排了细密的情节，文学评论家何平对马伯庸的这系列作品给出了一句漂亮且妥帖的评语：高密度的叙事仍维持住小说运动的姿势优美。

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将刊于《收获》杂志长篇小说春卷，与其感叹传统文学杂志和类型小说写作互破结界，不如说，文学的初衷是为了回应多数人的渴望。回顾《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这些以不同历史时期为背景的小说，从网络连载的爆款到《收获》杂志的新声，马伯庸何以成为格外吸引读者的说书人？

《长安的荔枝》被视为《长安十二时辰》的姐妹篇，“时间”既是叙事的推进剂也是强悍的主角。在《长安的荔枝》里，一个基层小吏要在六月初一杨贵妃生日前，把岭南的鲜荔枝完好地送到长安，从他不知情地接下这桩棘手差事到交

差的限期，留给他的时间不到四个月。这听起来是个熟悉的模式——《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和《长安的荔枝》这些小说里，给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作者在紧迫的时间刻度里安排了细密的情节，文学评论家何平对马伯庸的这个系列作品给出了一句漂亮且妥帖的评语：高密度的叙事仍维持住小说运动的姿势优美。

许多普通读者未必拥有针对小说写作技法的自觉和追求，他们能被深深吸引的秘密是什么呢？马伯庸曾说过，他很推崇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以考据手法写奇幻故事的方式做到极致”。他本人的写作其实也在实践这点，他把一个作者的审美野心转化为从知识的根系中长出繁茂的想象力的树冠。艾伯特·艾柯说：要讲故事，首先要建造一

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尽可能地用细节支撑起来。马伯庸的历史故事，即是在事实和想象之间摆渡，细节的考据是真实的，主角们的离合悲喜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戏剧，他在史实的废墟上重建了普通人的英雄梦想。《长安的荔枝》主角李善德，只是一个在敦煌写经卷名录中一闪而过的基层官员名字，他是被历史过滤的小人物，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他经历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背后盛唐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惊涛骇浪，他以卑微身份质问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取之于民，用之于上，谈何不劳一文？在历史的情境中想象普通人的抗争，这实在切中当代读者的情感命门。正如作者本人的感悟——发乎细节，观乎时代，体人心而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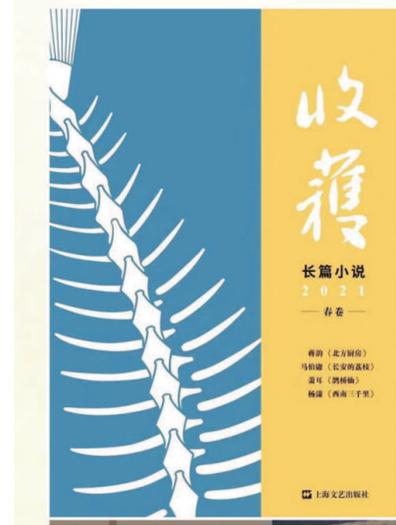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鲁迅有些不服气：“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这段对话，恰好可以视为历史跟历史文学之间的一次交谈。对于历史，我们要求严谨真实，半点不得含糊；而历史文学则更注重戏剧性，要好看，要跌宕起伏。对于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来说，每一次提笔，总会面临一个藤野先生式的两难困境，真实与好看，何者更为重要？注重前者，往往失之呆板；注重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总是战战兢兢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小说作者的职责。他需要忠诚地沿着史实的方向奔跑，但不必始终不离这一条跑道。要知道，真实历史的记载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留有大量空隙等着去填补。比如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了鸿门宴的具体过程与最核心的对话，但并没有记录更多细节。假如我们要写一部以鸿门宴为主题的小说，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加入想象：刘邦前往鸿门之前，内心是如何忐忑？项羽与范增之间，又有哪些价值观上的冲突？张良是跟樊哙怎么说的，他才义无反顾地冲进宴会？种种细节，都是历史书上所未曾记载的，只能靠作者自己去想象——即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有一版序言是郭绍虞先生写的，特别贴合这个话题，他说：“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就没办法写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去伪存真、剔异求同搜集出一个线索，所以历史知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这还是一个创作，所谓创作应该是自无而成，西方人说叫做making out of nothing。创作和著作不一样，写历史小说困难之处在于姚雪垠能把独特、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还要自静而到动，到动到一般人写得活。姚氏能做到这点，《李自成》一出版就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虚构并非是全无限制的，它不一定要遵循历史真实，但一定要遵循历史的逻辑。以鸿门宴为例，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对话当然可以虚构，但必须符合两个人当时的身份与心境。在鸿门宴之前，项羽刚刚破釜沉舟击败秦军，诸侯无不敬畏，没想到先入关中赢得天策荣誉的，却是个出身低微的刘邦。他此时的状态，应该是骄傲、自矜中带着愤怒。骄傲，让项羽在鸿门宴上对刘邦没给好脸色，安排在羞辱性的臣从席位；愤怒，使得他纵容项庄去挑畔，但对出贵族的自矜，让他有些迟疑，没有对刘邦痛下杀手。这样一种复杂心态，司马迁并没有明确写出来，但结合项羽前后的经



制图：李洁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历、出身与性格，我们不难推断出一个合理的猜想，并展开文学性的渲染。

2014年我曾经搞过一次自驾游，跑一圈诸葛亮北伐路线。从成都出发一直到剑阁、汉中，围着秦岭转了两圈。整个旅途中，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汉中。汉中有个地方叫勉县，是诸葛亮屯兵练兵之地。当地有一个著名景点，叫做武侯真墓，是诸葛亮的坟墓所在，位置正好是在定军山脚下。

当我注意到这个细节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三国志》里记载说，“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但书里没解释，诸葛亮为什么要把自己葬在定军山？很奇怪啊，定军山是黄忠斩夏侯渊的地方，诸葛亮为什么对这里情有独

钟？于是我决定爬到山上去看看。定军山是勉县最高的山，我一爬到山顶，霎时有了一个感觉。我似乎知道诸葛亮为什么有这样的命令了，因为站在定军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勉县的情况。北伐的屯田之处、练兵之处、打造军械之处、办公场所，站在山上全都看得非常清楚。诸葛亮为什么要葬在定军山？因为他舍不得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北伐事业，希望自己死后，也能注视着后继者把北伐进行下去。这个猜想，并没有任何史料佐证，写成历史论文肯定是通不过的。但从人性的角度，我觉得是个很合理的解释。我们总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葬在定军山的动机，完全符合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有的时候，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光彩，甚至会牺牲一些细节真实性。

2019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波希米亚狂想曲》，讲的是英国皇后乐队主唱佛莱迪·摩克瑞的生平。我是皇后乐队的粉丝，所以看得很细。电影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段落：在Live Aid演唱会前夕，佛莱迪在排练结束后，对其他三个同伴坦承自己得了艾滋病。但他表示不需要同情，鼓励同伴们说咱们一起在温布利球场上好好创造一次奇迹，最后绽放一次光芒。

这个桥段非常感人，但它并不符合真实历史。事实上在那次演出期间，佛莱迪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清楚，后来才查出来得了艾滋。编导把这件事挪到了演出之前，戏剧性一下子就强烈起来，观众情感被充分调动。皇后乐队中的两名成员也是这片子的顾问，所以不可能不

知道史实如何，但为了艺术效果，牺牲一些真实感也是正常的。事实上，这些艺术上的改动，往往更加接近更高层次的历史真实。一般我们说起历史真实，有三个层面。最底层的是硬件真实，衣食住行、服饰建筑等等，像汉代背景的小说里，就不能出现玉米、红薯，这些农作物到明代才传入中国；第二个层次是软件真实，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风俗人情、礼法准则等等。比如唐代女性地位，和明清礼教兴盛时的女性地位，是大不相同的。在文艺作品里，作家必须在这两个层次有所追求，方能使作品体现出特有的时代风貌，令读者信服。但除了这两个层次之外，创作者的意识还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当下潮流作出呼应。如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它

的时代背景是从海上之盟到靖康之耻的北宋末年，讲述了腐朽愚昧的大宋朝廷如何一步步断送中原，为强虏所侵略的过程。他在书中对于东京汴梁的描述，可谓极尽精致，让人读之感觉亲身回到了那个繁华时代。所以当靖康之耻发生时，汴梁的毁灭就格外令人震撼。徐先生创作这本书时，恰好是抗战期间，所以《金瓯缺》虽是描写徽宗君臣，亦隐隐暗含着对当局抗战无能、神州陆沉的沉痛影射。这种艺术上的虚构与提炼，让古代史事与当代读者之间连起了一条共鸣之线，反而更能令历史本身反射出更为璀璨的光芒。以史实为纲，以逻辑为线，寻空隙而作，体人心而鸣，发乎细节，观乎时代，则作文之道，庶几近之。

《克拉拉与太阳》，与石黑一雄的阳光

■本报记者 柳青

在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里，克拉拉是个用于陪伴孩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依靠太阳能运作。她被14岁的女孩乔西选中，此后数年，克拉拉和乔西在一起，直到后者进了大学。完成“服务”的克拉拉先是被困置，后来被送去垃圾处理的堆场。折旧并丧失了大部分功能的克拉拉在堆场无法自由行动，她试着把自己重叠起来的记忆梳理清晰，从她在商店的展示橱窗里第一次看到乔西向她跑来，到乔西离家去上大学时她挥手告别。“拼合的记忆充斥我的头脑，栩栩如生，让我半晌回不过神，忘了自己正坐在堆场里，坐在硬邦邦的地上。”

小说行文的结尾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被弃的人工智能回忆着自己作为伴侣玩具的职业生涯，“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让乔西避免了孤独”。这个情境伤感，也很熟悉，很像《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不是吗？孩子长大了，玩具该往何处安身立命？如果这个类比显得不够严肃，不如这样说，“克拉拉”让人联想石黑一雄过去写过的角色，他们默默行使完自己的职能，而后成为“多余之物”，《长日将尽》里的管家，《莫失莫忘》里作为器官捐献者的克隆孩子们，他们殊途同归的命运是成为被覆盖在记忆暗影里的孤儿。

把司空见惯的经验陌生化

石黑一雄不回避他的写作中“似曾相识燕归来”，他曾对英国媒体记者说：“我创作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我总在写同一本书。”这种坦率并不意味着石黑一雄是一个自我重复的作家，他反面对孤独、遗弃和记忆的主题，一次次在出人意料的情境里把人们以为司空见惯的经验陌生化。也许，他从未发明新的经验，但他总能在旧的经验里找到新的视野，新的发现。

《克拉拉与太阳》用克拉拉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她拥有超乎寻常的观察力、旺盛的好奇心和强大的共情能力。她看起来像法国女孩，顶着短且利落的发型。但她看世界的方式和人类是不同的，比如在她困惑时，“眼前呈现的不再是统一的画面”，空间被分割成或多或少方格。某天打烊后她观察着经理是不是对自己失望，“在一格中我看到她从腰到脖子上的身体，紧张的另一格完全被她的眼睛占据，眼睛中都是善意和悲伤，那三格中展现她的下颌和大半张嘴，在那里我察觉到愤怒和沮丧。”每当面对不熟悉或无法理解的情境，克拉拉眼中的世界就会“像素化”，她所见之物成为立方

格的排列组合，分裂之后再逐渐整合成一幅画面。

在克拉拉的认知过程中，当代生活中似乎寻常的情境一次次地变形重组，她一次次深入了人间丰沛又含混的情感领地。她像一个等待被装满的容器，不倦地容纳在人类看来不值一谈的感情体验和经历，将心比心的关爱和理解并不是天赋，而是持续学习的结果。在物质极度丰饶的发达技术时代，太多人沉浸在个人的痛苦和执念中——乔西的母亲终日恐惧女儿会夭折，里克克的母亲执着于让儿子实现阶层跃升，青梅竹马的乔西和里克意识到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渐行渐远……太多人因为过于顽固的“自我”而对旁人麻木冷酷时，试图和所有人共情的克拉拉，始终怀着初学者天真的热情，观察并体恤着她身边的一切人事。

机器成了感情用事的老派人

在石黑一雄笔下，技术迭代把一部分体面人挤出舒适的圈层，沦落到“满是黑帮满屋是枪”的社区。中产家庭的父母们恐惧阶层跌落，为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他们让子女接受基因提升，尽管这样做会让子女有生命危险。没有接受基因提升的寒门子弟，将与与名师名校无缘。逐

渐进入人类主流社会的机器人遭遇结构性的族群歧视，“你们先抢了我们的工作，现在又来抢剧院座位？”科学和技术没有弥合阵营的撕裂，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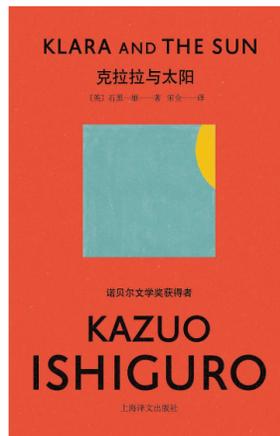
在高效运转、情感剥离的人间，人变得机械化，机器却学习做一个美好的学生，学会爱，并输出了爱。观察和核能力超强的克拉拉最初被乔西的母亲选中，并不是作为乔西的陪伴者，而是替代品——万一乔西死了，克拉拉将“成为”乔西，延续她的存在，“直到两个乔西没有任何差别”。制定这个计划的卡帕尔迪先生自称是理性信徒，他劝导乔西的母亲：“我们这代人保留着老派的情感，执着地想要相信每个人内核有无法触及、独一无二的东西。但那里根本什么都没有，我们必须放手。”自认为“老派”的人把感情用事当作需要纠正的偏差，以为机器可以在最大程度的学习后，取代人。机器却在学习的过程中看清：“卡帕尔迪先生错了，他找错了地方，非常特别的东西不在乔西心里，而在爱她的心里。”

在堆场，即将成为废铜烂铁的克拉拉对偶遇的商店经理说：“假如真的有那样做的必要，我确信我是可以延续乔西的，但事情最后有了一个明显更好的结果。”克拉拉注定不能成为乔西，因为她拥有了自我，她的“自我”是根植

于爱的感情，并且，她为乔西实践了一次爱的壮举。在小说高潮的部分，克拉拉成了真正感情用事的老派人，她把乔西痊愈的希望寄托于对太阳的信念，一个靠太阳能续航的机器人，祈求她的生命之源照拂她所爱之人，她为了完成对太阳的承诺，让自己遭受了不可逆的损伤。最后，把奄奄一息的乔西从死神手里抢回的，不是先进的医疗，而是近乎孩子气的“晒太阳”的奇迹。

写作者的阳光，给无可慰藉者以慰藉

石黑一雄是想树起“糟糕的人类”和“机器人信徒”的二元对立么？并不是。在《莫失莫忘》里，凯西去看望老校长时，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太说了异常悲怆的一段话，她回忆起自己曾看到童年的凯西抱着洋娃娃跳舞：“我看着你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了某样别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那非常好，却又是一个非常无情和残忍的世界。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抱着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别让我走。”这是石黑一雄始终执着书写的内



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

容：新旧两个世界的冲撞，旧世界已成远山淡影，长日将尽，在两个世界的裂隙里，多少孤儿被抛弃、被掩埋、被遗忘呢？他们付出所有之后，无所归依。《长日将尽》的男主角说：“我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达令顿老爷，现在，我什么都给不了。”凯西立于诺福克的旷野，看着四处翻飞的垃圾，想象自己从童年起失去的一切会被海水冲上岸。克拉拉“尽了一切所能去做对乔西最有利的事”。无法动弹的她在堆场观察太阳的行程和空中的鸟群，任重叠的记忆充斥着自己的头脑，她行将变成残破的碎片，但她的记忆还在。石黑一雄“反复书写的同一本书”，是给这些迷雾中的记忆赋形，记忆让被遗忘的人们显形，这是写作者的阳光，给无可慰藉者以慰藉。